

生態哲學與神學的建構（上）

■ 梁燕城

大湖在消失中

二〇〇一年《地球物理研究季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表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研究員郭米高 (Michael T. Coe) 及傅利 (Jonathan A. Foley) 的論文「人與自然對乍得湖水量的作用」(Human and natural impacts on the water residences of the Lake Chad basin)，指出這大湖正在迅速地縮小當中。這是一震驚世界的消息。

乍得湖是非洲最大的湖，其水供應了旁邊四個國一千多萬人口，以及無數動物的生存。其位置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是沙漠與西非熱帶雨林區的交界處。在一九六三年其面積達九千七百方萬哩（二萬五千平方公里），如今卻只剩二十分之一的面積。大部份已沙漠化，成為劣地。人造衛星顯示，目前湖水已退到南面，成為一小湖。

美國 CNN 電視新聞在二〇〇七年尾做了一個特輯，到乍得湖拍攝，發覺湖中心原有六呎水深，如今已全部乾涸，成為沙漠，湖中的魚也因環境變劣，已越來越細小。人、動物、樹林、農田，均已漸失去水源供應，形成嚴重的生態危機。這報導令英語世界大為震動，一個大湖的乾涸，影響一千多萬人及無數動植物的生存，這意味著甚麼？

根據郭米高與傅利的研究，這大湖消失的危機，原因來自人為因素多於自然因素。

他們是用一電腦模擬的方法，去探索四十三年來，湖水的可能變化因素，如氣候的全球暖化及人為因素的影響。研究各不同因素結合下，如何產生與觀察一致的後果。

發現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九年，湖面縮小的影響了百分之三十，而人為因素只佔百分之五的影響，但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四年，人為破壞因素增加了四倍，其影響湖面縮小達一半。

兩位科學家結論說：「在整個大系統的影響中，人是最大的演員。乍得湖所發生的一切，或許在表明我們在往何處去」[注一]。

過去乍得湖的水源來自夏天的雨水，但可能因著地球變暖，氣候反常，雨水不至，形成長年河水的乾旱。而人為因素，則是太多填湖種草蓄牧，及砍伐樹林，變為草地，最後因乾旱，草地又變為沙漠，樹和草的蒼翠世界都消失了，大湖也在消失之中。

當然，根據不少研究顯示，地球暖化也是受人為因素影響，因此大湖的消失，正標誌著人的作為，正逐步破壞了大自然的整體和諧與平衡。乍得湖縮小，只是在更大的生態危機的其中一部份，整體是天、地、人架構的失衡。

地球暖化是受人為因素影響，大湖的消失，正標誌著人的作為，正逐步破壞了大自然的整體和諧與平衡。是在更大的生態危機的其中一部份，整體是天、地、人架構的失衡。

地球變暖，氣候失常，人類文明的發展已來到大危難的邊緣，但大部份人仍是營營役役，只見眼前利益，而不知時代的緊迫性。

全球生態危機來臨

乍得湖的縮小和消失，只是全球生態危機的一部份，反觀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內陸湖羅布泊，早已乾涸而消失。洞庭湖、鄱陽湖、太湖等均在縮小，水位日漸下降，長江、黃河等水量亦減少，淤塞問題越來越嚴重。內蒙到河北一帶，迅速沙漠化，每年使北京面對龐大的風沙暴。

全球的危機亦十分嚴重，如北極溶解，全球旋風增加（二〇〇五年發生 Katrina, Emily, Rita, Wilma 多個五級颶風，歐洲旋風每年由一百八十次增加到三百次，美國由每年八百次增到一千一百次）。夏日熱浪（二〇〇三年八月各地平均溫度約三十九至四十度），雨水有時太集中，有時又沒有，旱澇重重。

根據二〇〇七年 IPCC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報告，一九五〇年以來，每十日就有一日極熱的例子，增加百分之十五，一日最低溫時期平均也增一度，高溫期百分之零點五[注二]。

英國 Hadley Centre 模擬歐洲由一九〇〇年以來的氣候，如果單從自然變化運作，並不符合所見的現象，但若加入人為污染所造成的影響去看，則與如今現象接近。證明加入人為因素後，四倍機會大於純自然因素，引發二〇〇三年的全歐恐怖熱浪。此外，美國國家環境研究中心 (US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也得出相同結論。

這不單是氣候的科學研究中心得出此結論，在美國最具權威的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在二〇〇六年發表報告，也承認現今可能是二千年來最熱的時代[注三]。全球變暖已是一個事實，而不只是環保份子的理論預測。

地球變暖的原因很複雜，但大多數科學家及重要研究所均指出，主要原因來自溫室效應，而溫室效應來自人類工業文明不斷排放二氧化碳，目前每年排放最少

二百六十億公噸，平均每人排放四公噸。從前這只來自局部的先進國家，如今則因中國和印度的興起，及第三世界國家也工業化，結果變本加厲。

一九九二年聯合國在京都開地球高峰會議，決定穩定溫室氣體。一九九七年定下了京都協議 (Kyoto Protocol)，要求減低一九九〇年所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降百分之五點二，到二〇一二年達百分之二十九。

結果一百六十三國簽署，但排放量最大的美國，聯同另一大國澳洲卻拒簽。其他先進國簽了之後，也議而不行，單是加拿大，到二〇〇七年不單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結果效果甚微。

如今因全球變暖，可以預測海水可能到二一〇〇年升高至七米（二十三呎），地震、海嘯、旱澇之災均增加，二〇五〇年可能有百分之三十七物種消滅。這是地球生態危機的年代。

生態學之父海斯高

地球變暖，氣候失常，北極溶解，海水升高，大湖消失，河流乾涸，森林破毀，饑荒處處，旱澇成災，生物絕種。已成為如今肉眼見到的現象，不再是環保份子的危言，也不只是科學家的預測。人類文明的發展已來到大危難的邊緣，但大部份人仍是營營役役，只見眼前利益，而不知時代的緊迫性。

面對這些問題，是人類整體的共同危機，不再是一國一族的事，卻是全球的事。人必須超越一國一族的事，去用一個全球框架去反思，進一步也須用一個宇宙整全的框架去反思。

全球框架或宇宙整全框架思維，涉及環境保育的，在近代始於十九世紀海斯高 (Ernst Haeckel, 1834-1919) 在其 *Generelle Morphologie* 一書中，提出生態學 (Oekologie, 英語是 Ecology) 一辭。

生態學的希臘文是 Oekonomie，來

自亞里士多德，Oekos 是指「家」，其義是家務弄得井井有條，今用這辭是指自然的整體安排原是有序，人對自然萬物應善用資源，不要浪費及造成混亂。

一九七七年 D. Worster 研究生態學的根源，指出這辭的最早是一八六六年由海斯高首先應用這辭在生態學的意義上 [注四]。此外，Anne Bramwell 的生態學史也同意此說 [注五]。

海斯高提出其一元論 (Monism) 的思想，認為宇宙源於一體，心物不須區分，宇宙有統一之能量，充斥每一空間，這能量是精神與物質之統一。一切生物都是在一體中彼此相關，成為一大生態網。生態學一辭，就是指研究「有機體及其環境之間關係的科學」 [注六]。Bramwell 指出，海氏的生態學是「是從有機體的處境去了解，特別是其生命循環，環境及其在能量應用循環中的位置」 [注七]。

海斯高並未全面發展生態學的學問，只是提出了一個大方向，建立了一個思維的框架，就是視宇宙為一整體，一切物質與有機體均統合為一互相平衡的全體，並認為人須向自然學習智慧，破除十九世紀流行的人為中心的思維模式。

不過他的一元論並沒有成功成為主流思想，主因在其跟從者將之變成一種拜自然的宗教，否定現社會運作，要人回歸原始的自然生活方式，但卻沒有多少信徒跟從。一元論另一條發展路向與進化論結合，主張進步，但進步的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卻不斷濫用資源，製造污染，正正是毀滅生態平衡的元兇。故海斯高雖是生態學之父，他本身思想卻沒有成功，其貢獻主要在打開一個整體性思維的框架。

二十世紀生態學的發展

生態學之父海斯高提出的一元論，有點非驢非馬，既非科學，也非宗教，更非哲學，故其學說不久後即湮沒。但其用「生態學」一辭，及其全球性視角看地球問題，卻有不少繼承者。包括各不同部門

的科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等，如一九〇九年 Jacob Von Uekhull 提出「環境」(Umwelt, 英譯 environment) 一辭，主張人與環境之互動，Konrad Lorenz 從「動物行為學」(ethology) 尊重動物在其環境中之自主性。又有主張回歸自然的文學家 Henry Williamson，自然觀察作家 Richard Jefferies 等。

還有經濟生態學，漸將生態學觀點推向文化與政治的舞台，如 Wilhelm Ostwald 寫《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 一書，指出宇宙的能量資源，是有限的，宇宙不會有新增能量，「可用的自由能量，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注八]。人若濫用資源，將引發各種饑餓與災難。故人必須小心保育資源。

又有一九二一年諾貝爾獎得主費索迪 (Frederick Soddy)，他指出實証科學是一神話，又預測原子彈的出現，他認為能量是一切生產的條件，能源作為一種資本，本身不能生長，卻會被浪費掉。宇宙是依熱力學第二定律運作，一切會走向能源失去，及由有序走向無序。唯一辦法是由政府去控制各種資源及銀行借貸，使不能濫用和浪費。 [注九]。

二十世紀初至中期，各種不同專業和研究出來的理論，分析和批判人類科技發展破壞大自然，資本主義不斷鼓吹消費，能源不斷被無端消耗，生態危機的日益加重等等現象，漸構成結合出來的思維，就是須從全球框架看問題，而不能只由各國各族自身努力，卻須大家合作來共同面對一個地球性的整體災難。

一九七二年是一個重要里程碑的年份，就是芭華特 (Barbara Ward) 及杜布斯 (Rene Dubos) 向聯合國「人類環境全球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提交長篇報告「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指出人類科技的強大力量，將可破壞地球，而地球只有一個，毀滅了就無地可逃。故人必須走出只關注家庭和國族的心態，而要

人類科技的強大力量，將可破壞地球，而地球只有一個，毀滅了就無地可逃。故人必須走出只關注家庭和國族的心態，而要關注全球，否則下一代將會見到全球危機形成不可逃避的處境。

《增長的極限》，正式使世界知道這面臨人類的大危機，即如果人類如此發展下去，必會達至一極限的臨界點，而可以引至崩潰，故必須重新制定一種均衡的增長模式，才不會引至地球與人類的災難。



關注全球，否則下一代將會見到全球危機形成不可逃避的處境。

在這重要報告宣佈全球危機時，另一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 to Growth)也引起世界震動和注意。這報告來自一個後來甚有影響的組織，就是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這組織在一九七二年成立，正式建立全球思維框架。

《增長的極限》建立新框架

羅馬俱樂部創始人貝切伊(Aurelio Peccei 1908-1984)，早年在義大利進行反法西斯抵抗運動，被捕入獄十一個月，期間思想到人有巨大潛能，且思想自由獨立，不會因囚禁而失去。

戰後事業有成，關注到人類面對的地球危機，後來認識「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科學事務部主任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合作探討通過一個全球框架來思考當前人類問題，視人類社會與其環境為一個複雜的動態體系。邀請一批這類精英來進行小型研究會，用全球模擬去分析全球的問題。

一九七二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福

萊斯特(Gay W. Forrester)教授用一個世界模擬的數學模型世界三(World 3)，與其助手米都斯(Donella H. Meadows)等，完成了羅馬俱樂部的震撼世界報告：《增長的極限》，正式使世界知道這面臨人類的大危機，即如果人類如此發展下去，必會達至一極限的臨界點，而可以引至崩潰，故必須重新制定一種均衡的增長模式，才不會引至地球與人類的災難。

《增長的極限》一書提出一些生態的參數(ecological constraint)去探索人類在地球的可用資源，與人類本身在人口和發展的增長有所互動，而可能產生的後果。其參數主要有五：

1. 工業化的加速；
2. 人口增加；
3. 營養不良的普遍發生；
4. 不可再生的資源趨枯竭；
5. 環境的惡化與污染。

這五點是按全球系統的互動來計算，而預測未來可能的危機。

這五點的增長，是按數學的「指數增長」(exponential growth)，非一般常識上所想像的「線性增長」(linear process)。所謂指數增長，是指「一個

數在某一持續時間內，經常以本數的百分比增加〔注十〕。如酵母菌，每十分鐘各細胞分裂為二，其增加是百分之百，以後即按倍數不斷增加，這種增長將使地球資源達極限而崩潰。

其結論有三：

1. 如果以目前這五點增長趨勢不變，則在未來百年之內，總會達到增長的極限，人口和工業會出現突發和不可控制的衰落。

2. 這趨勢是有可能改變的，關鍵在生態和經濟上建立穩定狀況，追求全球性的均衡。

3. 若想達至第二項結果：越早開始工作，其成功機會越大。

這一切問題的出路，是均衡（equilibrium）的增長，均衡定義是「人口和資本在本質上是穩定的，對引起增減的各種力量加以控制，使歸於平衡」〔注九〕。即引起人口和資本增加及減少的對抗力量平衡或均等。「只要資源能作明智的經營，在計劃上有長遠的打算」。則增長極限的危機可以延至很長時間之後才來臨。

三十年後跟進「增長的極限」

《增長的極限》最具震撼性的影響，是其超越了國家與民族的觀點，以全球框架看人類發展帶來的問題。此外，其內容也超越了那些神秘主義與無理性根據的浪漫自然愛好者理論，而從科學及可測量的模式，去探索未來的可能危機，其客觀性可學術地討論。

當年曾引起相當大的迴響，特別其預測是否準確，引發很多讚譽與批評。到一九九二年，即二十年後，同一組學者發表《超越極限》（*Beyond the Limits*）一書，跟進二十年的新發展，發覺二十年前的理論已得到引証，各方証據顯示，其預測的人類問題正在發生，包括森林正在以不能持續的比率被消毀，糧食生產漸追不

上人口增長，饑荒處處，氣候可能變得更暖，臭氧層正在洞穿。人類正更進一步移向不能持續發展的臨界點。

二〇〇二年，同一組學者再出版《增長極限的三十年新跟進》（*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指出三十年來人類有了不少改進，如新科技發展，顧客購買習慣有改進，國際條約簽定，人口發展略為減慢等。

但各方發展的証據，仍與《超越極限》一書所預測的一致，即超限揮霍（overshoot）的模式仍是繼續。九十年代糧食成本增至高峰，漁獲則大減，自然災害帶來的代價也激增，清潔食水及燃油正在短缺。強國正不斷噴廢氣，五十四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降低，達百分之十二的全球人口變得更貧窮。

最大的問題是「超限揮霍」（overshoot），這名辭主要 Matis Wackernagel 在一九九七年的「地球議會」Earth Council 提出。他的小組計算人類在生態上的所作所為，與地球資源所能負擔的供應，指出人所消耗的，超過大地所能承載的百分之二十〔注十二〕。

「超限揮霍指走得太快太遠，偶然無意地越過了界限」〔注十三〕其發生自 1. 快速變化；2. 變化有極限；3. 對極限及控制變化的錯誤或拖延了解。此中的極限包括了地球本身的承載限制〔注十四〕。這必須從地球作為一整體看，才能掌握其危機。

其最後提出「持續系統的轉向」（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system）。主要是「針對背後的原因，停止冒進，理解人類當前的社會經濟系統結構正在「超限揮霍」而越過極限，正走向崩潰，故須尋求改變系統的結構」〔注十五〕。那不是革命而激進地改變權力系統，卻是改變現在的反饋結構和信息連結系統。特別是人在系統中所運作的觀念，目的，動機，代價等。用新的信息去改變社會的運作方式，使超限揮霍的情況轉化為均衡發展。改的是思想，不只是科技。

工業文化的社會，系統地發展個人主義，正正是如今產生不能持續發展的最深理由。其實人與人像兄弟姊妹之愛，對人類全體的愛，對大自然的愛，對保育地球之要求，才是解決現今問題的出路。

如今的文化和社會是與保育環境，尊重生命，珍惜資源是背道而馳的，人類必須深切反省現行的思維模式，解放思想，選擇另一思想和文化方向，才會使人與地球全體得到保育而持續發展。

播信息，若將可持續發展化為網路信息，向全球推廣，將可改變傳統的超限揮霍思維。

3. 傳播真相 (Truth-Telling) —— 保證有關全球真相的信息，不會被謊言所扭曲、壓抑或拖延。

4. 學習 (Learning) —— 由於人類有深厚的無知，故必須通過各種渠道，去教育人民，認識如今問題迫切性。「學習是指有意願去慢慢認出情況出來，去改正有關實際行動和果效的信息，特別當行動無成果時那些不受歡迎的信息」[注十九]。由之而學習開發新路向。特別領袖們需要去學習，有勇氣去講出真相，建造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須有正確信息，才有正確的行動，故學習就是必須的。

5. 仁愛 (Loving) —— 此報告最後以提倡仁愛作結。指出工業文化的社會，系統地發展個人主義，人際競爭，短視的成就，正正是如今產生不能持續發展的最深理由。其實人與人像兄弟姊妹之愛，對人類全體的愛，對大自然的愛，對保育地球之要求，才是解決現今問題的出路。現今的文化「不相信，不討論，不發展這些更高價值的人性品質，其選取的後果將是導致悲劇性的極限」[注二十]。仁愛 (Compassion) 可使人建立全球合作的精神，及使各方均了解自己和他人是全球社會的一份子。

如今的文化和社會是與保育環境，尊重生命，珍惜資源是背道而馳的，人類必須深切反省現行的思維模式 (Mental Model)，解放思想，選擇另一思想和文化方向，才會使人與地球全體得到保育而持續發展。

西方文化的迷執與膚淺的環保

要解決當前社會與文化帶來破壞整體生態環境的危機，必須建立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一種全球框架的思維，一種尊重天地人的倫理。

心理學家格洛汀娜 (Chellis

可持續的革命

在《增長的極限——三十年跟進》一書中，指出現今全球仍是有「超限揮霍」的危機，終會形成地球承受不了的災難。唯一出路，就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重視有素質的發展，而非無止境地擴張，使各方面的增長能均衡互補。

「可持續的社會」(the sustainable society) 的定義，根據一九八七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研討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partment) 的報告《我們的共同未來》一書的定義「可持續的社會是一個可以達至當前需要，而又不必妥協地犧牲未來後代去達至他們的需要」[注十六]。關鍵概念是注意貧困的需要，及限制使用科技與社會組織加諸環境的需求，不能超過環境所能承擔的。

在《三十年跟進》一書提出，可持續的發展是指「能在不同世代中繼續下去的，有足夠遠見足夠彈性，足夠智慧，而又不低估物理及社會之支持力的」[注十七]。這社會的實質運作，是不斷監督發展中的反饋循環 (feedback loops)，使其不致引發指數增長的危機。在一切發展之前都有計劃，「先問增長是為了甚麼，誰會得益，付出的代價如何，持續到多長時間，還有增長如何配合大地的資源及對大地的污染程度」[注十八]。

該書更提出「持續性革命」(Sustainability revolution) 觀念，這需要一種思想的解放，舊思維的更新。這包括以下各點：

1. 遠見 (Visioning) —— 從想像去建立一持續發展的遠見，包括視持續性為最高社會價值，控制生育，使人口安穩，物質供應充足而安全。使人在工作中得尊嚴，不是無意義地過活。建立有誠信的領袖。經濟是服務環境的，及各種照顧全體需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系統等。

2. 網絡 (Networking) —— 網絡是傳

Glendinning) 診斷當今西方文化的病源，認為西方文化正在一種「原創痛」(Original Trauma) 中受苦，這「來自系統地使我們的生活移離大自然，移離自然的循環，移離生命力本身」[注二十一]。

這是一漫長的歷史發展，而形成一極端處境。至今是使人類「無家可歸」(homelessness)，「那是我們已與原本的家隔絕了，與大地隔絕了」[注二十二]。格氏認為現代人有很多掙扎和痛苦，根源就在人與大地的隔絕。現今人陷入執著沉迷的大海，如浪漫愛情、性關係、購物狂、毒品、酒精、自我毀滅、鬥快車、侮辱他人等等。每一個迷執的人，也都因受到他人的否定和侮辱而來。

她指出西方社會的根源問題，是一種「科技迷執」(Techno-Addiction)，使人迷執於用科技方式看世界，也迷執於一些科技產品如電腦、電視、甚至飛彈等。

如何醫治人的這些迷執呢？格洛汀娜並無具體答案，只有一思想方向，就是破除對科技的依賴與迷執，回復與大自然的關係。「我們須使生活整合一種新的哲學，能表達出一種學會復原的智慧，及一種人類曾經享受過的文化智慧，即大地為本的，生態的和本土化的」[注二十三]。

所謂「大地為本」(Earth-based)，代表了西方當代生態思潮的一個方向，就是對「單以人類為中心」(Anthropocentric) 思想的批判。

一九六二年卡遜(Rachel Carson) 出版其名著《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提出環保的危機問題，來自現代科技發展的威脅。她關心大地及其上的各種生物生存下去的尊嚴，質疑整個西方文化是以單人類為中心，以為人有權去操控大自然，且以為「大自然的存在是為了人的方便需要」[注二十四]。這就是針對「科技迷執」之批判，在生態危機出現以後，有些環保份子仍是擺脫不「人為中心」的思想，如生物學家 Barry

Commoner，認為環保之目的是為人類自身的生存，認為不須控制人口，應付增長，只關心一般的城市污染問題，而不關注對大地上所有生物的保育，後來即被批「膚淺的環保主義」(shallow environmental movement)。反對者則提出「大地優先」(Earth first) 的口號，而稱為「深度生態學」(deep ecology)。

生態學的中國哲學轉向

因著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態危機，西方保育自然的生態學大大發展，學派林立。其中較具有哲學意味的，是所謂「深度環保」(deep ecology) 運動。這觀念最先是勒伊思(Arne Naess) 在一九七二年一個第三世界前途會議中提出來，指出環保運動有兩方面，一是膚淺的，單以人類為中心的運動，只關注已發展國家中的污染、資源不足，及人民健康等問題。另一是以生態為中心的(ecocentric)，「否定人在環境中(man-in-environment) 的形象，重關係性的，整體場所(Total-field) 形象」[注二十五]。這稱為深度環保，以人與生態全體為一體的，各種生物不是為了滿足人而存在，卻與人類相關。A 和 B 的關係是其構成的一部份，關係斷絕，則 A 和 B 也不成為其自身了。這概念是以人和萬物同構，合而成一整體場所，這可稱為生物圈(Biosphere)，必須以此為中心思想，稱為「生態中心」，以別於「單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

一九八六年勒伊思提出深度生態學的八點，主要觀點是「地球上人類與非人類生命的美滿與生發，均有其自身的價值。這價值是獨立於人類為了自己目的去利用非人類世界的」[注二十六]。人類必須明白，人是沒有權利去破壞非人類生命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人必須有意識形態的改變，去欣賞萬物而非制宰萬物。

這種哲學可以說是一種大地哲學，以「大地優先」，「生態中心」來取代現代文明之「單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

人類必須明白，人是沒有權利去破壞非人類生命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人必須有意識形態的改變，去欣賞萬物而非制宰萬物。這種哲學可以說是一種大地哲學，以「大地優先」，「生態中心」來取代現代文明之「單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

道家思想重視「以無觀之」，無掉了外力的理論，不能不以外加的力量去轄制萬物，生態才能得到真正的自身發展，環境才能得到真正保育，可持續的理想才得完成，這是生態學的中國哲學轉向。

從中國哲學去批判反西方生態學的思想，就是西方不斷找尋一些「中心」作為思路基本。如中世紀至近代是以「上帝為中心」(Theo Centric)，現代是「單以人類為中心」，後現代則是「生態為中心」。用中國名辭，即是探索以「天為中心」、抑或是以「地為中心」還是以「人為中心」呢？

中國哲學卻不同，道家哲學一開始就反省「以叉為中心」的思維方法有問題。任何有立足的思想，必會因其固定的觀點而構成了一種思想理路，而一成為理路，就會有其限制，形成一種「成心」，即偏見之心，而不能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亦即不見道作為真理之全面性。

故此道家思想重視「以無觀之」，「無為而無不為」，方能以萬物本身觀萬物。所謂「無」、「無名」、「無為」等，即走出「以叉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如此，才能就天地人之整體，去觀天地人，而不以外加的理論去架構萬物。無掉了外力的理論，才能不以外加的力量去轄制萬物，生態才能得到真正的自身發展，環境才得真正保育，可持續的理想才得完成，這是生態學的中國哲學轉向。

[

[注一]參考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Vol. 106 No.D4, P3349-3356, 2001.

[注二]這報告可在網站 www.ipcc.ch 讀其全文。

[注三]二〇〇五年六月七日與十個其他國家科學院共同呼籲八大工業國關注全球溫室效應形成的地球變暖危機。見網站 www.nasonline.org/site/page_server/pagenane-news.archive

[注四]見 *Nature's Economy, The Roots of Ecology*, San Francisco, 1977. p192.

[注五]見 *Ec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A History* New Hav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9.

[注六]同上書，頁四〇引述。

[注七]同上。

[注八]見 *Natural Philosophy*, London & New York, 1911, p.184.

[注九]參考 *Cartesian Economics, The Bearing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Upon, State stewardship*, London 1992.

[注十]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William W. Behrens IV, *The Limits to Growth*, NY. Universe Books 1972, 中譯引自朱岑樓，胡薇麗譯《成長的極限》，台北，巨流一九八二，頁一四）。

[注十一]同上書中譯本，頁一八五。

[注十二]參考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注十三]見 Donella Meadows, Jorgen Randers, Dennis Meadows, *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 VT. Chelsea Green Pub. 2004. p1.

[注十四]同上，頁五。

[注十五]同上，頁二三六。

[注十六]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2, 整章都討論這概念。

[注十七]見該書，頁二五四。

[注十八]見該書，頁二五五。

[注十九]同上，頁二〇。

[注二十]同上，頁二八一。

[注二十一] *Recovery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 George Session, ed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Massachusetts, Shambhala Pub. 1995 p.37.

[注二十二]同上。

[注二十三]同上，頁四〇。

[注二十四]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p.297)。

[注二十五]George sessions, ed., *Deep Ecology for the 21th Century*,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1995, p151.

[注二十六]"*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同上書 p.68.